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九〇期 ——
(二〇〇四年八月三出版)

本期目录 (zk0408b)

【难忘岁月】“造反派”公案未了，杨小凯，你不能走	刘国凯
【问题讨论】杨曦光去了，但我仍然坚持对曦光历史贡献的看法	王希哲
【亡灵祭坛】翦伯赞之死	章怡和
【千秋功罪】从历史轨迹思考林彪问题	陈益南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难忘岁月】

“造反派”公案未了，杨小凯，你不能走

• 刘国凯 •

—

杨曦光，听到你远行不归的消息，心中有说不出的悲痛。年轻时的潜意识是世界永恒，生命也永恒。直到“知命”将届时，才陡然意识到世界确是永恒，但生命却十分有限。中国大陆男性平均年龄 69 岁，美国男性平均年龄 74 岁。这就是无情的“限”。而你 56 岁就远行别去，赵品路甚至还未及“知命”。天地万物间，人的生命有时会是多么的脆弱和短暂。

生命的有限提示人们须抓紧现有的时间去作需要作的事情。何谓“需要”？各人有自己的理解。我的理解是，就社会范畴而言，除了一个经常性的事情——为国家的民主转型出一份微力外，就是为文革造反派正名。而这也就是我与你友谊的基础。

1968 年春寒料峭之时，我在广州看到你执笔写的“中国向何处去？”（见本刊 zk9906g ——编者），是广州造反派组织打着批判的名义印发的。我看了无比钦佩和极感振奋。钦佩你有如此敏锐的思维和述说出来的勇气，并由此激起坚持斗争的意志。我在广州造反派内部

说：巴黎公社运动是马克思支持的。湖南“省无联”被中央点名是一回事，巴黎公社原则是正确的又是另一回事。为什么我们不能为实现巴黎公社原则继续奋斗呢？

春寒料峭过后紧接着就是酷暑的血雨腥风。我们的“奋斗”在无产阶级的“铁拳头”面前显得实在是渺小不堪。六、七月间，两广造反派组织相继被共产党党军和保守派组织（应予正名为保党派或保权派）联手血腥踏平。广西造反派和四类分子被砍杀、枪决后抛入珠江的尸体顺流冲下，搁浅于各处浅滩，有的则直达香港阜头。

在这大疯狂的乌风浊浪中，我惦记着你。湖南“省无联”的命运会比广州红旗派更糟。

你——文革“极左派”，后被再更名为“极右派”的代表人物当局加给你的会是什么呢？六八年夏季的大疯狂后还有1970年“一打三反”的大规模冷血处决。这么多凶险关隘你挨得过去吗？

七十年代末，中国浮现解冻生机，我在广州创办民主油印刊物《人民之声》。就在这时，报纸上出现一则消息，“杨曦光刑满出狱”。啊！杨曦光，亲爱的朋友，你还在。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我早已把你视为那个时代的灵魂和象征。你代表着我们这一代的理想和追求。我一直担心你已被那狂风恶浪吞没。你能侥幸熬过那个草菅人命的疯狂年代，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啊！

杨曦光，你的才智也是出类拔萃的。你总是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前头。就象当年我们还只会就事论事地揭露抨击一些共产党官僚挥霍享乐欺压群众时，你已能清晰地指出中国出现了一个“红色资本家阶级”那样，当高考恢复和成人高校兴办，我们得以补十几年前就该完成的大学课程时，你早已越过大学阶段成为一名数理经济研究人员。当我来到海外，只能以蹩脚的英语去谋取一份糊口的职业时，你已以纯熟的英文写出了深获导师高度评价的博士论文。

后来，你又任教于美、澳的高等学府，人们对你的称谓已变成杨小凯教授。可是我与你联系时仍然称呼你杨曦光。是怀旧？是落伍？是陈腐执拗拒绝现实？应该不是，那是什么？是对你当年杰出事迹牢嵌于心的记忆和发自肺腑的推崇，也是委婉地提醒你所身负的历史责任。杨曦光这是个充满着历史内涵的名字，它与那个时代青年社会变革者的心迹和磨难紧相联结。我珍惜这个名字、尊重这个名字、敬爱这个名字。世界上经济学教授成千上万。华尔街上的经济学博士多得可以用网来捕捞。可是，在多达八亿的人群中，在那个躁动而迷信的年代里，能石破天惊地指出“红色资本家阶级”业已形成的人有多少？只有一个，那就是年仅十九岁的小青年杨曦光。

是的，我的提醒是多余的。你在继续堆高你的经济学造诣时，丝毫没有忘却你的历史责任。你在写出《递增收益和经济组织》等经济学专著时，也写出了“为文革造反运动恢复名誉”等文章。你敢于毫不含糊地宣称自己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你指出文革造反运动具有反政治迫害的正义性。你痛心中国民主浪潮的被割裂。文革造反派拒绝五七年的老右派；七九民主墙派排斥文革造反派；八九学运派又不接受七九民主派。你沉痛地指出，中国的民主能量总不能积累，每一次都要开头重来。

为文革造反运动正名是一件多么艰难危险的事情。你发表在《中春》上的文章遭到数倍文字的围攻。那是九十年代初，我正挣扎在维持生计的劳顿中。一天打两份工，十四个钟头。虽疲惫不堪，还是写了呼应你的文章。九十年代中，你出版了非同凡响的《牛鬼蛇神录》。

我看了感奋莫名。我想那些出于对历史缺乏了解，或被中共伪文革史所蒙蔽的善良人们看

了你这部著作后会有所省悟了。

后来你给我来信，请我替你《牛鬼蛇神录》写篇书评。我颇感意外，因为大凡写书评者的学识及社会坐标都应高于书的作者。而现在情形刚好相反，怎么你会请我写呢？我不方便问，但我私下推测是，那些更有资格写书评的人们对文革造反运动的评判尚未转过弯来。于是，我勉为其难地铺开了纸笔。我细细地再读，细细地思索。读着读着我钻到书里面去了。我回到了那个年代。那个光谱重迭善恶交织的年代；那个迷信和狂想同时盛行的年代；那个反抗者的呼喊淹没在屠杀者枪声中的年代。我震撼；我沉思；我时而拍案而起；时而泪水盈眶。我的笔无法收止，一节又一节，一章又一章，我把书评的题目定为“鲜血凝成的价值——评杨曦光的牛鬼蛇神录”。反复修改写成后已是九八年了，不下三万字。这怎么是惯常的书评呢？你亦向我发出疑问：“你写得这么长，有哪家杂志能够出呀？”。是的，我都不好意思向胡平等《北春》诸友要求刊登我这篇书评。而象我这样没有知名度，没有高学位的民运分子，除了《北春》，就几乎没有其它发表文章的途经。（近年多了个“黄花岗”）怎么办呢？有负你的托付，我心情十分忐忑。一拖几年。后来我决定出一本文集。定名为《草根蝉鸣》。“鲜血凝成的价值”收录其中。这本文集于03年11月正式推出。我向你报告了此事。算是对你的托付作了个迟到的交代。

二

大约是前年，我听说你为病患所困，心里十分不安。去信慰问，你的回复安详豁达，我亦心安了许多。后来又在网上得知你病情得到控制，康复得很好，精力充沛，还能去讲学演说，我更为你高兴。当代医学高度发达，对这种病已有不少医疗手段。只要不是太晚期发现，医疗效果还是相当乐观的。我所认识的病人中就有五年以上的健在者。我相信你会战胜病患。然而，没想到，噩耗竟突然传来了。

你过早地离开给你周围的人们留下无限的悲痛。太太失去了好丈夫；孩子失去了好父亲；经济学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学者；朋友们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在你的朋友圈中，我的沉重不知是不是会比其它人多了一重内容。那就是我一直期待着在为文革造反运动正名的作业中，你来起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段时期你投入经济学研究的精力是多一些，这很自然。我想，今后当你的时间周转过来后，你会再度上阵的。然而，现在我的期待被噩耗彻底击碎。

癌细胞，你这可恶的癌细胞，我与你共戴天！

有的人见我们如此执着地要为文革造反运动正名，以为我们曾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显赫一时。其实，我们都没有做过头头，更没有在所谓的“新生红色政权”

占一席之地。也正因为我们是生活在或了解到社会底层，使我们洞悉底层人民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反抗行为。现在这些反抗共产党政治迫害的正义行动正被共产党的御用历史学家抹黑为动乱，诬蔑为“暴民”。但是，当这些搞“动乱”的“暴民”被共产党定性为“反三红”的“反革命分子”并予以严加镇压后，就不言而喻地说明了“动乱”的“暴民”恰恰是共产党专制政权的正义反抗者。而那些文化革命中真正的暴民——由共产党干部子弟所主导的血统论红卫兵和工厂单位里的保党派骨干分子，他们虐杀黑五类和反抗民众的暴行却得到共产党的包庇、赏识。共产党不但没有责罚过这些文革中真正的暴民，反而在其后恢复共产党正常统治秩序的时候，提拔他们，任用他们。这说明文化革命中真正的暴民正是共产党暴政的基础和支柱。

为文革造反运动正名从历史角度来说是要还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真相，对之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就是要为反抗共产党专制政治的行动冶炼合法性。现在，共产党对民间的反抗动辄以文革动乱冠之，吆喝道：“你们又想搞文革动乱？”如果我们毫不含糊地为

文革造反运动正了名，那我们就可以干脆地回答共产党，我们就是要搞被你们称之为文革动乱的反政治迫害运动，直至终结你们这个一直在实施政治迫害；一直在剥夺人民政治权利和人身权利的专制政权。

杨曦光，你走了，我感到空前的虚弱和孤单。戈贝尔效应已在中国文革研究中出现。在与已被共产党铺天盖地的伪文革史所熏昏的知识界乃至民间的辨析中，没有你的参与，力量将会是多么单薄。造反派公案未了，杨曦光，你是不能走的啊！

可是，你是走了，实实在在地走了。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人生百岁，究有一终。人人都终要回归自然，走入历史，即使是权倾一时、显赫无比的帝王也罢。可是，你毕竟走得太早了，“宴席”散得太快了。悲伤和惋惜不由得塞满了我的心间和胸膛。

然而，人生虽有限，人世却无涯。历史在延续，生命在代接，黑夜之后总还有白天。悲痛使人忧伤，但擦去伤感后还须面对现实。杨曦光，为文革造反运动正名的工作我会坚持作下去。尽管我身单力薄、力不从心，但誓效精卫，愿为蚕蜡。你说过，相信文革中造反派的反政治迫害运动终将在历史上恢复名誉。我确信你的预测一定会成为事实。

杨曦光，我神交三十六年但终未能见上一面的好朋友，我永远尊崇你、怀念你！愿你安息！

□ 2004年7月10日凌晨1点10分于纽约

~~~~~

#### 【问题讨论】

杨曦光去了，但我仍然坚持对曦光历史贡献的看法

• 王希哲 •

刘国凯先生在其文集《草根蝉鸣》中，对我在《关于李一哲思潮》一文中对杨曦光的历史贡献的评价，有过批评（p434）。近日，曦光故去，我们都很难过。但国凯在他的纪念文章《“造反派”公案未了，杨曦光你不能走》中，显然仍然包含了对我的批评。我和国凯对曦光几十年的友情，是感情。但文革史的研究是科学。科学与感情是要分开的。读了国凯文，我仍然坚持《关于李一哲思潮》（附于本文之后——编者）对曦光历史贡献的看法。先把此文列在下面，最后，再谈谈曦光。

最后谈谈我对曦光今天的看法。

一个在历史上提供了自己的思想，造成了相当影响的人，与一般作家不同，他对自己后来思想的转变，一般是应该作出交代的。例如，我作为“李一哲集团”执笔人，我们原来是主张“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后来我又是怎样扬弃“社会主义民主”，接受宪政民主并为之奋斗的呢？我在我的自传《走向黑暗》中作了交代，那是在狱中读完马克思《资本论》四卷本后的心得：

伟大的马克思。这部书对我的影响是“划时代”的，它是我从“光明”走向“黑暗”的分水岭。如果说过去我还是被共产党驱迫着走的话，那末在此之后，我则是自觉地向“黑暗”走去了。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我在“中国之春”民主运动中所写的那些文章：《民主的方向》、《无产阶级专政是人道的专政》、《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等，实际上，不过是我这段时间读《资本论》的笔记罢了。决定我思想变化的主要几点是：

一，“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它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这个自然的过程。因此，无论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抑或中国的社会主义，无论建立它的动机多么崇高，试验多么伟大，在自然的经济运动规律面前，它们都是要最终失败的。

二，“一国社会主义”或“数国社会主义”能不能取得成功，根本不是所谓国际资本的锁链能不能在其薄弱环节被打破的问题，而是一个国际市场问题，一个决定于现代国际化大生产的世界贸易网的问题。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生产（除非它坚持小生产）不可能脱离世界市场。斯大林设想的二个平行的不同经济体系的世界市场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是根本不能长期存在的。强大的自然的高效率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要把行政强制的“社会主义市场”吸引过去，淹没过去，迫使它按自己的面貌来组织生产和交换（即所谓“改革开放”，并进而使它不得不按自己的面貌来改造它国内的经济和政治的关系。这样，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命中注定的了！

三，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专政职能的基础是经济管理的职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个职能由组织生产的资产阶级来执行。共产党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官僚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共产党官僚是这个国家生产的计划者和组织者，它就当然掌握了专政的职能。这个专政之所以不可能是民主的，只能是专制的，秘密在于它必须强制地去组织生产和分配。而它之所以必须强制地去组织生产和分配，就在于它一开始就是用强制才建立了这个违背自然规律的经济制度。如果不改变这个制度，哪怕一个真心希望民主的“开明的”共产党领袖，也是无能为力的。而正因为他越开明，他的结局也就越悲惨！（《走向黑暗》第十九章“冰川下的春潮”）

但曦光原来是一个毛泽东公社理论的崇拜者，他问，“中国向何处去？”，然后他大声疾呼应该按毛泽东指引的方向，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巴黎公社似的“中华人民公社”去：“试看明日之中国，必然是‘公社’的天下”。那确是当年造反派的最高理想。杨曦光是造反派理论的集大成者和最后，最高峰代表人。三十年后，他再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杨教授已经西装革履也是一位西方宪政民主主义者了。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他似乎从来没有明白告诉过我们。1990年（希哲还在狱中），曦光在他的《“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始末》一文开首，提到了两个评价他的《中国向何处去？》历史贡献的人，一个人是刘国凯，一个人是王希哲，而他判定刘国凯是“水平最高”的。言下之意，当然希哲对他的评价是水平不高或较低的。这无所谓，我关心的是，他是怎样对自己的思想转变作交代的，但就在这篇他最应该作出交代的《中国向何处去？》历史回顾专文里，我找不到有任何交代。相反，文中他似乎还非常肯定这篇22年前的“少作”，看不出有什么对自己历史批判的眼光。又过了7年，1997年，我在哈佛费正清中心作文革史研究，曦光从澳洲来，我们相约在哈佛后门燕京饭店小酌，我又当面问到了他何时转变？如何转变？的问题，甚至问他，如果四五他在天安门，他站在哪一边？是站在周恩来一边，还是站在中央文革一边？是站在“工人民兵”一边，还是站在为周恩来送花圈的群众一边？曦光不正面回答，顾左右而言他，我也作罢。

曦光后来叫了“小凯”。杨小凯教授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中，作出了杰出贡献，更以此举世知名。但我还是怀念36年前的曦光。我认定，杨教授的经济理论和研究，没有他作，别人会作。但36年前杨曦光的历史贡献，没有他作，别人作不出来。他作了，他成为了中国文革反叛的异端思潮的发源，这是他的任何后人都无法企及的。

唉！他死了，英年死了。又是一个“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天哪！天哪！

2004年7月15日于美西海湾

附： 关于李一哲思潮

（此文发表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号《中国之春》，后王希哲略有校订）

值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发表二十周年前夕，我收到了前广州民刊《人民之声》主编刘国凯先生（笔名金玉山）寄来的一篇文章《略论文革造反派》，此文发表于去年十月号的《北京之春》。

刘先生的文章很好，历史地、恰当地评价了文革中的造反派，我很欣赏，但对极左派、极左思潮的评价以及认为李一哲大字报是极左思潮的哺育物，则似不妥。文中是这样说的：“‘极左思潮’哺育了一代民主战士。震动全国的七四年广州李一哲大字报事件，便是鲜明例证。李一哲三人及他们的战友，都是文革中广州造反派里的中坚分子。”

对刘先生的这个论断，实话说，我有些意外。是不是所谓“旁观者清”呢？作为李一哲思潮的作俑人，我记得，它正是在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和扬弃中形成的，让我回忆一下那时的情况。

一九七二年——一九七四年，极左还是反极左是中国政治斗争的焦点。那时在中央，毛泽东、中央文革与周恩来、王若水一派斗争着；基层不少人士包括我本人，也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向报刊投去，鼓吹反极左。某晚，在中山大学东门外，我与王意坚（中大八三一头头）激烈地辩论极左还是反极左的问题。当时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在与他争夺对广州造反派的理论控制权。然后，我组织了李正天、郭鸿志、陈一阳撰写给人大的公开信《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大规模地在街头挑起了公开的辩论。

这场辩论，决不是一场形而上学的，于人民毫无意义的上层权力斗争，实际上，它决定着今后中国的发展方向，它为后来的“四五运动”作了舆论准备。它兆示着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败落以及我后来称之为“人民的文化大革命”，即独立的、自觉的现代人民民主运动的兴起。

我们可以从后来的四五的实践来证明它：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无论在南京、北京、上海，其参加者只可能是反极左思潮的同志、朋友或同情者，而不可能是杨曦光、鲁礼安等人代表的“省无联”、“北决扬”。如果在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六这八年时间里，杨曦光们仍发展着极左思潮，没有任何向相反方向的反省的话，他们不但不可能投入“四五”运动，不可能并肩与曹志杰、王军涛、陈子明站在一起，相反，他们只可能是“四五”的敌人，是毛泽东、华国锋、江青镇压“四五”的坚决支持者。道理很简单，他们的纲领就是要打倒周恩来，而李一哲及其同志、同情者则要保护周恩来。

李一哲与“省无联”、北决扬“都出身于造反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泾渭？

一九六七年秋冬，在经历了造反、夺权、镇压、运动的高潮、低潮迭次起伏以后，中国的造反派已经对文革最终的目标发生了疑惑。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跟着“两报一刊社论“和中央首长讲话”亦步亦趋地前行，奉献了巨大的热诚甚至青春和生命，而最后又被告知，他们犯了错误，理应受到镇压和批斗。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要走向哪里？他们开始独立地思考起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问题来。

首先发生了广泛影响的理论思考的结果是湖南“省无联”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我们的使命》及“北决扬”鲁礼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派》等。他们的理论特征认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要彻底铲除新的官僚阶级，建立

起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没有官僚的巴黎公社式的“中国人民公社”制度。而周恩来是右派，是这个官僚制度的总代表。他的力量太强大了，毛泽东不得不再再地在周的面前迂回、退让，并把红卫兵、造反派作为他每次退让的牺牲品，替罪羊。

这个理论在其总方向上与毛的文革理论并不冲突，因此它被视为“左”，但它毕竟突破了毛的理论框架，一下子把中共的内部矛盾毫不掩饰地暴露并推向了极点，这就立即危及了中共政权。它遭到了毛、周派联合起来的扑灭，也是理所当然的。于是这个思潮又被视为“极左”。它是造反派探讨文革，并突破官方文革理论的产物。

《中国向何处去？》闪耀着革命理想主义的光芒。它有如一阵狂飙扫荡着弥漫全国的“看破红尘”的颓气。它那一往无前、誓不回头的志士仁人的气概以及它的力度，它的文采都是空前的，开辟的。杨曦光是李一哲的先行者。

李一哲思潮的特徵又是什么呢？“省无联”“北决扬”敢于突破中共理论框架探讨的勇气，曾经鼓舞和启发了李一哲。王希哲、陈一阳于“七三”、“七二四”布告后亡命武汉，还曾专赴浠水拜访“北决扬”理论家，《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作者冯天艾。杨曦光则因入狱，无缘相见。

然而李一哲终究没有继续向左去而是掉过头来向右走去了，为什么呢？这主要是一九六八年后的广东发生了三件大事：

一，林彪、黄永胜的几名部将为稳定他们的基地，在广东许多区县（包括海南），大肆屠杀群众。而这一片片恐怖的血腥，都是在“落实无产阶级专政”的“左”的旗帜下进行的。

二，广东各县城，尤以广州为首，发生了风起云涌的复退军人要求恢复附加工资运动。李一哲介入了这场运动。这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工人经济主义运动被扑灭后，中国工人阶级再一次自觉地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的运动。它深刻地教育了李一哲：文革极左的经济政策及左派鼓吹的共产主义分配方式是行不通的。

三，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宝安、惠阳、中山等毗邻港澳地区，在学大寨运动中，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知青逃亡潮，不少公社男丁逃亡一空，知青逃亡率达90%以上。

王希哲本人在惠阳考察这一逃亡潮时，亦被疑为偷渡知青，押入淡水、樟木头收容站一个多月。这些偷渡客，这些“社会主义的叛徒”大都是贫下中农或他们的子弟。这无情的事实开始使他朦胧地感觉到：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充分给个人以发展天地的经济制度，现代资本主义对人民的吸引，都是不可阻挡的。

然而，李一哲并没有突破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框架，相反，他们仍然忠于这个框架并竭力企图表现对它的忠诚。他们仍然希望建立一个完美、理想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来。他们相信这个制度会如列宁所说百倍地优越于资本主义，关键只在于说服毛泽东。于是他们写文章《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在他们的文章里，虽然已经提出了一些现代民主宪政的纲领性要求，然而，他们却绞尽脑汁地去马、列、毛的著作里寻章摘句，把这些要求说成是本来就符合领袖们的教导，只是后来斯大林没有作好。奇怪的是，他们又居然能在大围攻中把官方的“理论权威”论敌驳得哑口无言。

对文革中垮台的共产党的大批老干部，李一哲与造反派一样，认为他们是一批理应受到人民冲击的官僚，但他们并不赞成“四人帮”为取而代之必欲置他们于死地的做法。因为他们感到，与其让一批满嘴胡说八道的暴发户、新特权阶层、新官僚上台使国家继续朝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极左走去，还不如让那些“对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官僚重新上台，稳定和发展国民经济，现阶段对人民略为有利。因此，在文章里，他们毫不掩饰地为老干部直言，为周恩来说话，并公开地向“四人帮”宣战。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广州造反派大字报再次上街，却没有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没有人公开响应江青、王洪文的点火，攻击老干部“还乡团”还乡，这与李一哲作了造反派头头们的大量工作，并把一些已经跳出来或准备跳出来的造反派头头置于自己的理论影响之下是分不开的。

正因为如此，当毛泽东、中央文革严令以赵紫阳为首的广东省委批判“李一哲反动思潮”（注意：不是极左思潮，他们是分得很清楚的）的时候，共产党的老官僚们却普遍表现出对李一哲的同情。这也能够说明，为什么赵紫阳一手组织了全省对李一哲空前的批判，另一手却在实际上保护和向全国宣传了李一哲！

需要指出的是，坚持极左立场的部分造反派头头（以王意坚为代表），这时却紧跟广东省委炮轰李一哲，继续成为中央文革凶恶打手！

可见，李一哲思潮是向右走的，不是向左走的，它汲取了极左思潮的养料，但它不是“极左思潮”哺育出来的。刘国凯先生在这点上可能研究不够，搞错了。

有人会问，既然方向不对，为何后来无论“极左思潮”的代表如杨曦光或李一哲思潮的代表都走进了一条共同的争取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战线里去了呢？

如果从共产党的眼光视去，资产阶级性的民主宪政，自然是极右（共产党有意忘记了，一九四九年前，他们就是喊着这个口号，发动了二十几年的“动乱”，牺牲了几千万人的生命，才取得政权的）。杨曦光先生这二十多年来，有没有对他当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极左思潮有所反省，我不清楚。从他现在的文章看来，应该是有的。这不奇怪，因为他现在面对的是共产党专政机器的压迫。就算是没有罢，就算是他今天仍坚持着他一九六八年“红色中华人民共和国”罢，这也并不妨碍他和他的同一思潮的朋友们介入民主运动，特别是“六四”以后的民主运动，或成为其同盟者。共产党理论有一句成语：形左实右，极左必然最终走向极右，这是有道理的。我们看香港第四国际托派是怎样一贯坚决地站在大陆民主运动的一边，就可以理解极左与极右的关系了。

李一哲思潮，他的走向极右，更好解释一些。我们看民主运动的历程，从李一哲大字报到“四五”，它们一开始就是右的。共产党官僚在文革中的地位也是右的。因此，邓小平们是欢呼“四五”的，决不会骂它是什么“动乱”或“自由化”。甚至，直到民主墙运动初期，邓还眉飞色舞地向外国人介绍西单的这堵墙，说它“好得很”。

但是，蜜月很快结束。民主运动很快就意识到：在帮助官僚们打败了他们的极左敌人后，官僚们是不能允许任何人对国家政治提出进一步的，根本性的民主改革要求的。现在这台机器回到他们手里了。这是官僚的特权所在，命根所系。如果刚刚获得平反的民运不愿或不敢承受新的压迫的话，他们就只能俯首贴耳，甘心作为使用完结了的工具，退出舞台（李一哲四人就是这样分裂了），就象当年的造反派在毛泽东、中央文革手里，作为炮灰，作为筹码，作为只配为他们的“伟大战略部署”卖命，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再呼再来，再挥再去的工具一样。

然而，历史是不能重复的，人格意识已经苏醒，便不能使它再昏醉下去。如果说以毛泽东



之尊严，尚不能逃脱在他最后的一年里，人民对他的打击，邓小平又有什么力量克己复礼，障百川之东下呢？于是，我们看到了近十几年来一幕一幕的冲突：民主墙，学潮，更大的学潮……终于，镇压发生了，枪声响了；坦克开过来了；体制被突破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无不胜的坦克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昨天总还算表示拥共的人们赶到了反共的一边去了！如果说，十几年前，魏京生大字报倡言反共，还“和者必寡”的话，“六四”以后的民运，则以与共产主义理论决裂为时尚，以反共为特征了！

“六四”的枪声也传进了监狱。我爬上窗口，从窗台缝中抠出收藏的钉子，在墙上刻下了几句诗：

黑云乱来露金甲，满城何事雨天花？ 长安卷去火正急，金水扑来坦克车。 拼将飞灰不死鸟，留得民气愤怒蛙。燕赵慷慨悲凉地，又见抚尸哭叛徒。

第二天，监狱当局传我问话，要我谈六四的看法。我说：“共产党的监狱把王希哲改造坏了。把王希哲从一个不反共的人，改造成反共的人了！”

关于李一哲思潮，我就先谈到这里。我希望听到刘先生和其他朋友、文革史家们的批评意见。

刘国凯先生除了寄文章外，还有一封信。他说：

“当初，在你刚入狱的时候，我们从良民百姓的善良愿望出发，以为这是中共巨头为了尽快获得他们的所谓‘安定’局面，而摆出的吓人姿态，一俟局势‘稳定’，你们会大大提前释放的。然而，我们错了。我们对中共的凶暴远远没有充分的估计。你们不但年复一年地深陷大狱，其间还发生了‘六四’大屠杀约在八五年，胡耀邦主政时，曾露出一丝转瞬即逝的光彩。我们都以为你有提前出狱之望，不料风云突变，连胡本人都被打入了冷宫，七九民运囚徒们的苦海无涯了。”

“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实话说，在狱中那漫漫十几年的岁月里，我还没有为自己的什么错误哭过。今天，读到刘先生的这几句话，想想我们当年对共产党的天真，想想我们因为这天真付出的代价，也不觉有泪盈眶了。算了，算了，还是把泪擦干吧。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日

注：武汉“北、决、扬”即武汉“北斗星学会”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扬子江评论”。统称“北、决、扬”。

~~~~~

【亡灵祭坛】

翦伯赞之死

• 章怡和 •

1962年，雷海宗去世。噩耗传出，令所有听过雷先生课的人，无比哀痛和惋惜。这个学贯中西、博大精深的右派教授，同时能开“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中国商周史”、“中国秦汉史”、“史学方法”等四、五门课程。这个从不备课、从不讲究教学法、想讲什么就讲什

么的右派教授，以磁石吸铁的力量吸引着无数青年教师和学生。连学问好、资格也老的同行刘崇（金宏）都极其推重他，称其为大学问家。并对自己的学生说：“要好好听雷先生的课，他讲的历史课，有哲学意味。我做不到这一点。”^⑮

划右后的雷海宗，后来只在《历史教学》上发表一些教学参考性文章。去世的那年，他 55 岁。

几年后，“文革”爆发，导火索是被史学家吴晗的一出京戏《海瑞罢官》点燃。火苗窜出，翦伯赞不明底细为吴晗辩护，对前来采访的《文汇报》记者说：姚文元的批判文章“牵强附会”，态度极粗暴，完全是对吴晗的污蔑和陷害。“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史学家的翦伯赞，偏偏不知。没过多久，聂元梓的大字报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北大历史系第一个被揪出来、被批斗的就是翦伯赞。罪名是“黑帮分子”加“反动权威”。向达、邵循正、周一良、邓广铭、杨人F等人也都统统划为“牛鬼蛇神”，打入牛棚。

向达是右派，算有“前科”，受罪挨罚最多。他早有思想准备，曾对家人交代：如有三长两短，不要意外和惊恐。果然，于数月后，死在劳动场所。发病时，北大革命师生无人为其呼救。那里，也无医院。

死讯传出，父亲闻而恻然，哀叹不已：“是我害了向达。没有 57 年的事，他不会受这么多的苦！”

翦伯赞仍在北大。萋萋之纤草，落落之长松。他像草又似松，在寒风中苦苦挣扎。只要能争过来，再不幸，也值得。社会的凉薄残酷，人生的孤凄无援，都掩埋于恬静、坚毅而又苍老的外表之下。

一次，孙儿翦大畏从南方跑到北京去探望他。进门便喊：“爷爷。”他坐在椅子上，头也不转，只问了一句：“是大畏吧。”便不再说话，像一尊佛，参透了生死贵贱和荣辱。

1968 年 10 月，在中共举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老人家还以翦伯赞、冯友兰为例。说，今后还得让他们当教授，不懂唯心主义哲学就去问冯友兰，不懂帝王将相历史，便去找翦伯赞。又言，今后在生活上可以适当照顾。北大军宣队在向冯、翦传达了“最高指示”后，还把翦氏夫妇迁移到燕南园的一幢小楼，独家居住。他俩住楼上，派了个为他们服务的工人（杜师傅）住楼下。这时，谁都以为翦伯赞被毛泽东解放了。翦伯赞也以为自己获得了解放。

万万想不到：没过一周，致命之祸降临到他的头上。致命之物不是别的，正是翦伯赞长期从事的“统战”。可以说，他为统战献身，统战让其送命。事情曲折复杂，核心是关于刘少奇的定案问题。1968 年尚未废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已内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具体罪行之一是曾与蒋介石以及宋子文、陈立夫勾结。三十年代在蒋、刘之间周旋的人，就是谌小岑、吕振羽和翦伯赞等人。于是，他就成为刘少奇专案组所搜取的有关此事的证据，或许还是唯一的证据。1968 年 12 月 4 日刘少奇专案组的副组长，一个叫巫中的军人带着几名副手，气势汹汹地直奔燕南园。巫中向翦伯赞指明开始于 1935 年的国共南京谈判是刘少奇叛卖共产党的活动。翦所讲述的事实真相，巫中予以否认，并说：“这个罪行党中央已经查明，判定刘为叛徒、内奸、工贼。不久将在“九大”公布。你只要就这件事写一份材料。加以证明，再签上字，就没你的事了。”^⑯翦伯赞再次否认那次谈判刘少奇有阴谋活动。

最后，巫中说：只给你三天的机会。三天后我再来。

12月18日下午，巫中带着一群人又来，审了近两个小时，翦伯赞拒绝作出违反事实的交代。巫中猛地从腰中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说：“今天你要不老实交代，老子就枪毙了你！”

翦伯赞闭口不语。

巫中冲到跟前，把手枪顶在翦伯赞的鼻孔底下，大吼：“快说，不说马上就枪毙你！”

革命一辈子的翦伯赞，从未经受过如此恐怖的革命。他却依旧回答：“我没什么可以交代的了。”

为了继续恐吓他，巫中拿出笔记本写了几个字，交给同来的人（所写内容是叫他们先回家吃饭，再开车来接自己）。让翦伯赞误以为是叫人来实行拘捕。即使如此，在巫中独留的时刻，他依然拒绝交代。

尽管巫中空手而归，翦伯赞却已有轻生之念。他大惑不解的是：毛泽东说要给他出路，事实上的生路又在何方？原来都是假的，虚的，空的！

绝望之心，生出决绝之念。

第二天，人们发现翦伯赞夫妇服用过量“速可眠”，离开了人世。他（她）俩平卧于床。二人穿着新衣服，合盖一条新棉被。在翦伯赞所着中山装的左右口袋里，各装一张字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则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一个坚毅顽强的人，就这样骤然消失。翦伯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可能多有不足，但他的灵魂洁白如雪。古人云：进不丧己，退不危身。进不失忠，退不失行。——这是一个很高的行为标准和道德规范。绝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翦伯赞做到了，以生命为证。

贤淑娇小的戴淑婉也跟着走了。几十年来，作为妇道人家，柔弱的她只存在于小家庭。但在人生结尾处，竟是那么地耀眼。“柔软莫过溪涧水，到了不平地上也高声。”她以死鸣不平。

翦伯赞的自杀和字条，又像个死结打在我的心口，一直想解开，又一直解不开。对此，我请教了许多人。解释也是各种各样。翦伯赞的死，是对以暴力做后盾的中国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无声抗议，更是对眼下这个以暴力为前导的“文革”的激烈反抗。而手书的“三呼万岁”又是什么呢？——是以此明其心志，为子女后代着想？是对文革发动者的靠拢，在以死对抗的同时，表示心的和解？抑或是一种“我死你活”、“我长眠、你万岁”的暗示性诅咒？我总觉得翦伯赞不同于老舍，也不同于邓拓。他的手书“万岁”一定有着更为隐蔽和复杂的内容。

一天，我拿这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去问陈徒手。研究当代文学的他翻查过大量的“文革”资料。

他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文革”中自杀的标准格式。

我想：需要多么酷烈的力量，才能将一个史学家的体魄挤压到标准格式里！

翦伯赞的骨灰抛撒于何处？

据说，北大当时的负责人是决定要保存骨灰的，可派出的执行人在火葬场填写的“骨灰处理”一栏中却写着“不要骨灰”。孰真？孰假？至今无人说明。

1979年2月22日，官方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骨灰盒里放着三件物品：翦伯赞常年使用的老花镜，冯玉祥将军赠送的自来水笔，他与老伴戴淑婉的合影。

翦伯赞的学生不少。其中一人是学得不错的，师生关系也密切。“文革”爆发的一刻，此人贴出大字报，标题是《反共老手翦伯赞》，旁边配有漫画。画的是翦伯赞抱着一部《金瓶梅》，嘴里流着口水（注——那时，北大一级教授可购买一部《金瓶梅》，翦为一级教授）。官方正式给翦伯赞平反后，此人撰写长文，题目是《我的恩师翦伯赞》。

逼死两条人命的巫中，受“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他大概还活着。

“甚西风吹梦无踪！人去难逢，须不是神挑鬼弄。在眉峰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这是《牡丹亭·闹殇》里的杜丽娘于夭亡前，悲情苦境，触目酸心的咏唱。《牡丹亭》是令我百读不厌的古典剧作，尤喜以苦境写苦情的“闹殇”一折。汤显祖笔下的这个美丽少女甘愿付出生命作代价去到阴间，以换取不受强制性社会束缚的行为自由。杜丽娘的形象至今作用于我对生活的感受和理解，这其中就包括对像储安平、傅雷、翦伯赞这样一些——以生命换取自由的父辈的理解和感受。

□ 节选自“心坎别是一般疼痛——记父亲和翦伯赞的交往”

~~~~~

## 【千秋功罪】

### 从历史轨迹思考林彪问题

• 陈益南 •

1971年发生的林彪事件，主要包含二个问题：一是，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上开始引发的“论天才”问题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另一件，则是企图杀害毛泽东主席并搞武装政变的阴谋。

虽然，现在还有很多有关林彪事件的资料没有解密，但是，从目前已能看到的若干关键性资料中，我们还是基本能大致推想到一些问题的实质了。本文则是从历史轨迹的角度，对林彪问题所作的若干思考。自然，既尚属推断，就不一定正确，仅仅以此求教于读者与方家。

#### （一）九一三前，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

总体而言，林彪对毛泽东的态度是：

- （1）钦敬；
- （2）不盲从，有自己坚定的主见，但又在组织上服从；
- （3）当不同意毛泽东的指示时，他一般采取“拖”的软办法，直到或是毛泽东纠正，或是他自己认识了后改正。
- （4）对毛泽东，似无“取而代之”的反骨。

## （二）历史的回顾

### 例（1）

人们都知道林彪会打仗，其实，在解放军的众多高级将帅中，林彪也是最早就敢于拥戴毛泽东的一员战将。

说他是“敢于拥戴”，其证明，就是开初毛泽东的领导，在陷于困难之际，林彪却能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与拥护毛泽东。

1929年6月间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前后，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受到了包括朱德、陈毅、陈安恭（时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在内的部分高层领导人的批评压力，指责以他为首的“前委”（党的前敌委员会）对红四军军事干预过多，由此，毛泽东愤而被迫离职，离开了他一手创建的红四军，并提出要去苏联学习。而作为红四军所属四个纵队之一的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则不仅认为，仍应由前委书记毛泽东为首来直接领导红四军，这样确易于军事指挥的集中与敏捷，有利于作战。同时，他还认为，不让“前委”管军事，也就是向党分权，是错误的。在红四军的“七大”前后，林彪都在会上多次发言，旗帜鲜明地说出自己支持毛泽东的这些意见，甚至还敢公然当面指责时任红四军军长的朱德。

期间，林彪还请“前委”秘书江华，给毛泽东转送一封信，希望毛泽东不要离开“前委”，而能留下来纠正那些错误思想。

毛泽东则在1929年6月24日回复林彪的来信中说：“你的信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

那时林彪拥护毛泽东，显然不会有什么拍马屁之嫌，因为，当时从井冈山出来的工农红军第四军尚只有几千人，而毛泽东领导红军究竟能不能革命成功而打出一个天下，都是极微的未定之数。同样，林彪之所以拥毛，也不是什么稀里糊涂，而确是从井冈山时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他初步认识到了毛泽东不凡的领导水平。

林彪能正确地判断与认识明主的事实证明，也来得很快。自毛泽东一离开红四军后，红四军先后派出入闽入粤的二、三纵队，就接连打了几个败仗。这一来，在上海的党中央又发出指示信，将毛泽东派回了红四军再任“前委”书记，并主持召开了著名的红四军党的“九大”（古田会议）。

林彪在这个阶段所表现的政治立场与鲜明坚定态度，无疑对毛泽东一生都会有深刻的影响。否则，林彪在解放后并无什么特别功劳，也没去领军抗美援朝，还一身病恹恹的，不管什么具体事，但为何在1958年5月突然给林彪发了一份大大的“转业费”（毛泽东语）——这既不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更不是文革的1966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而是在1958年举行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呢？如果，将当时已是怕光怕风怕水怕出汗、还无法象常人一样入睡的林彪，无端提升为中央常委、副主席，可以看成是毛泽东与党中央给基本不管事了的林彪的一种政治待遇，一份荣誉“转业费”，那么，之中，无疑会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对林彪在1929年红四军时的表现所作的奖励。

### 例（2）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开始也是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对打南昌、夺江西也很有兴趣。而林彪则从军事角度出发，认为红军力量还小，而中国革命的高潮不会很快到来，故认为建立根据地与打南昌夺江西的战略很难实现，而建议采取灵活的游击方式去扩大红军及其的政治影响。所以，在1930年初对毛泽东写了那封后来被称为悲观主义的《新年贺信》，而毛泽东则给他写了后来改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回信。

对此，当时林彪是取何种态度，无记载可考。

但从二件事尚可揣测。

在1948年中央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拟收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时，林彪则提出不要在文中刊出回信收信者的名字，即林彪本人。此事，应视为林彪对毛泽东的尊敬与服从。

因为，不论是以1930年初当时的情况（作为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是时任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的鼎力助手），还是1948年的现状（林彪是毛泽东任命的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的总司令），毛泽东都绝不可能来公布明显于林彪不利的东西，而仅只是认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是个同志间理论讨论问题的历史文献。林彪则认为他在那信中说的是军事，与毛泽东回信说的革命高潮理论问题，不是一回事，因此，不希望由此被人误解。

实际上，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信中，也承认了“我知道你（即林彪）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只是“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只赞成闽粤赣三区域的游击……”。

这里，确没有什么政治上的悲观问题。

至于这革命高潮“迅速到来”的时间是多久？是十年，十五年，还是多少年？这问题，则是由历史学家们去界定回答的事了。但是，历史已表明，在毛泽东告诉林彪这革命高潮已是“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时的1930年之际，距人民解放军展开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而对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全面反攻的1948年，尚还有18年之遥。

因而，林彪始终认为自己写的《新年贺信》，说的是军事，不是政治。

所以，有了后来1969年8月，他上井冈山时写出“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的诗句。林彪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公开发表，所造成的一些对他的政治立场曾可能有过的误解，虽心有不平，但他总体上还是以服从而不公开辩护为主，只偶尔吐吐心中想法。

### 例（3）

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后，由于毛泽东复出指挥军事后的首战——土城战役失利，而后在整个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又带着部队不断来来回回的辛苦流动，以避强敌并择战机，此举更为大部分红军指挥员不解。因而，林彪便从军事指挥的角度，写信给中央，要求毛只掌军事战略大计，具体指挥改由行伍出身的彭德怀来干。对此，毛泽东在其后的会理会议上，虽批评了林彪，但，毛却没有怨林彪，他认为林彪还年轻不懂事，而将换帅的主意，怪罪到比林彪年长的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头上。

实际上，当时的林彪已是28岁、并是久经战场磨炼的主力红军红一军团的军团长了，而不是什么“娃娃”（毛泽东语）！明明是他提出了要毛泽东将具体军事指挥权转交给彭德怀的，可是毛泽东为何却不记他林彪的帐，反而却将愤怒全部发到了并不知情的彭德怀头上？

这看来是，因为经过数年上下级关系的磨合，毛泽东已深知林彪虽然常常爱执有不同意见，但却没有什么反对他毛泽东的个人成见；而且，他林彪的意见，相对毛泽东的战略指示，也常常只是具体战术级的不同看法。因此，他认为林彪的想法只是错误，而无反骨。

但毛泽东对比林彪年长、经历过旧军队长官生涯的彭老总的想法，显然就不一样了。发生于1930年的红二十军富田事变时，事变领导人曾发出过“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倒毛泽东！”的口号，也许也曾使毛泽东心中总留下了些对彭的疑虑。所以，同一个意见，毛泽东对林、彭二人的动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猜想。

在并不怪罪林彪的同时，毛泽东也认为林彪尚还年轻，看问题过于单纯，不知这个意见后面可能会有其他潜台词，因此，他便说林彪“你还是个娃娃，懂什么？！”——而这话的本质，看来应是教诲大于指责。

当时，林彪对此，自己也不以为然，从不以为自己是有组织错误，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当时不利的军事形势考虑而已。

所以，当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再次又将这件事抖了出来，以证明彭是历来反毛之时。林彪却站了出来，庄严申明，为此事真相承担了责任，说明那次政治错误是他林彪犯的，与彭无关。

当然，林彪只承认了是政治认识错误，而不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错误问题。

#### 例（4）

在解放战争期间的东北战场及辽沈战役中，林彪也是数次用软磨硬拖的态度，对待过他认为毛泽东不正确的指示。

1946年4、5月间的四平街防守战，林彪、黄克诚等都认为在当时那种部队战斗力尚弱的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不宜守城，而应灵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但毛泽东却一再电示，要“死守四平”，对守四平，不惜“准备数万人的伤亡”、“化四平为马德里”。对此，林彪不主张孤守，但他却不公开顶毛泽东，只是一而再、再而三由自己以及黄克诚电告中央与毛泽东，诉说部队的不利情况与自己的主张。只到5月18日，伤亡实在太太，杀敌一万，自损竟达八千时，林彪则不得不一方面电告中央，请求撤兵，同时一方面就先行采取了撤离战场的部署，待毛泽东来电同意撤退时，林彪的部队则已撤离完结。

后来的辽沈战役中，许多情况下，也是这样。

1948年的辽沈战役，共打了53天。而毛泽东与林彪两人，对此战役的部署意见之来往的“电报大战”，也往复各自多达七、八十封，时间跨度长达半年之久。

当然，毛泽东多是从权衡全国战场状况的战略高度发指示，而林彪则主要是从东北战场的具体局面考虑战役的打法。电报大战中，双方在对具体打法上，无疑总会有些想法不同之处。

例如，毛泽东曾要林彪“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专打锦州，以实现关门打狗的局面，待“长，沈之敌倾巢来援”再消灭之。毛泽东此举，自然是属雄才巨略的大手笔。

但林彪在具体施实中，却没有全按毛的指示办，并屡屡向毛申述他的不同意见。之中，他采取一方面多次报告请示，一方面围困长春，使长春敌人出不来，另外派了三个纵队牵制沈阳之敌，使沈阳敌人不敢全出，然后，才全力无后顾之忧地去攻锦州。甚至，直至在发兵进军锦州中途，又因出现新情况（敌侯镜如指挥4个军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从葫芦岛出发东进援锦来了，同时，还有沈阳的廖耀湘兵团十万大军，也在向西开进欲援锦州），使林彪认为“预备了一桌菜，却来了两桌客人”，便又拟改变攻锦州而重回师打长春，并向毛泽东发电请示。不过，在毛泽东尚未回电之际，林彪经再三审思权衡，又复而重去电毛泽东，表示不再犹豫，横下心来还是先打锦州之敌。

在这场“电报大战”中，作为统帅的毛泽东，有指示，有批评，有告诫，但却无强迫命令：“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而前方林总的电报，则有照办，有反驳，有否决，也有软顶与妥协，但在实行中，却基本服从毛泽东的战略大计。

这场“电报大战”之所以能和谐发生，而不会在毛、林二人心中产生什么芥蒂，是因为毛泽东与林彪，都深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的道理；也都明白，这并不是什么对抗毛泽东的举动。

“九一三”后批林时，将打锦州等军事问题也曾拿出来批判，以证明林彪在东北的反毛行为。后来，有关方面奉命停止了这些批判。因为，离开具体的情况，说林彪哪项作战计划是错的，是反对毛主席的，这实在只会让人看笑话。

#### 例（5）

林彪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中央常委会上说：在我们党，在中国，谁也不要以为自己是英雄，谁也不要做什么英雄，而只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我们都只有跟着毛主席，才会取得胜利。

林彪的这些话，虽是批彭，也顺便敲打了朱老总，但确实，这也是他自己处理与毛泽东的关系之原则的一次内心真实表白。显然，他认为，有毛主席在世，包括他在内，就谁都不要有想做大英雄的念头。既已有亮，绝不可又再生瑜。

虽然林彪在一些具体军事问题上，不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指示，但他知道，那是一方面因最高统帅部着重考虑的是全国战场，很多指示是必须要从全局角度提出的；另一方面，则又因前方随时变化不定的战局，对后方统帅决策造成的滞后效应所致，而并非是统帅部的水平低下。对毛泽东从井冈山始，尤其在长征中显示的力挽狂澜的雄才大略，林彪无疑是看到了的。

而毛泽东本人，对林彪经常在作战中拖磨软顶他的指示，显然也不以为然，也从没有过就此对林彪发出过实质性批评，或撤消对林彪的信任。

很多人没有注意过，1947年成立的新东北局（在四平街防守战之后），之中先后有四人是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张闻天、高岗），而东北局的书记、一把手，却是还只是中央委员的林彪！这个显然不合党的组织规则常例的局面，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对林彪的极大信任，而对林彪经常与他持不同具体军事意见一类事，显然概是不以为然的。



## 例（6）

解放后，林彪基本不工作了。从现在所知的资料看，林彪的身体的确很糟，他那些怪病，放在谁的身上，也会难受的。因此，从人之常情分析，一个因疾病折磨而已经享受不到多少人生乐趣的人，对权力的诱惑，究竟还能有多大的欲望呢？

实际上，1959年的出山，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实际也基本是虚席而已。军队的事，上有统帅毛泽东，具体做事有军委秘书长罗长子（罗瑞卿）顶着，他夹在中间，正好可以不管事，只做做应景的文章。

而文革开始，毛泽东又将他搬出来，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林彪虽不想上马，却也只好听从安排。

但是，从现在所知的材料中，林彪在文革中对刘少奇、邓小平，对周恩来，对那些老师，除了一些例行公事般的指责外，似并没有看到他有过头什么可视为首先发难、直接发动与下令整肃的内容之证据。而文革高潮中，谭震林还曾视林彪为挚友为裁判，写信向林控告江青等人。

至于比他林彪地位低的罗瑞卿、杨成武的被整，与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等人的被提拔，这等高层人事大事，相信也都只可能是毛泽东的意思，林彪绝对是没有这个本事的。

否则，林彪于1971年“九一三”时早就飞灰烟灭了，为何罗瑞卿、杨成武却还须被囚禁二年多，到1974年才获自由呢？还有贺龙元帅，也是到1974年九月才获初步平反的。

实际上，毛泽东也知道林彪有多大的能耐。1971年9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南萍、陈励耘等人时谈话中说：“（军队）后头是林彪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

当然，在那场几乎所有的党政官员们都被搅进去的文革运动中，是很少有人会不说不做一些或批判或攻击或指责他人犯有“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之类罪名的话与事。现在回过头来看种情况，不足为怪，也都不足都视其为错。区别的关键是，说那些话，做那些事，是有个人私利动机的主动而为，还是被动违心所做，是仅只能随潮流而已？

那林彪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又是属什么性质呢？

林彪在文革中，虽已贵为中央副主席、副统帅了，但他在中央究竟能作些什么主、能有多大的实权呢？

现在看来，当时林彪的实际地位，确是远不如原来的刘少奇。因为，作为中央的第二把手、分工一线领导工作的主帅，刘少奇是经常召集与主持中央常委、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会议，商讨党和国家的大事，拿方案定决策，再报毛泽东的。除毛泽东外，中央各部门的人与事，大多首先是得须汇集汇报到刘少奇处的，而在毛泽东作最后决定之前，刘少奇对任何事也都是有处置之权的。

而林彪呢？不要说他根本没有象刘少奇那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是由一个莫名其妙的“中央碰头会”在领导中央的工作；就是平日中央文革那帮人做什么说什么，也更不须经过他林副主席知晓或批准，而是直接就上报毛泽东的；甚至有时国务院周总理、军委杨成武代总长，办事也是直接通天。能让“林副主席”做的事，并不是需要他做决定后向毛泽东汇报什么，而往

往只不过是毛泽东批阅过后，再转发给“林、周、康”批阅的文件；那些需林彪主持的政治局与军委会议，也往往是讨论事先毛泽东已知道或已早有主意并批转下来，却并不需他林彪作决断的事；之中，林彪即便有过的批示，也往往是“请政治局讨论后呈主席批示”之类程序形式。

甚至，作为一个副统帅兼国防部长，边斩边奏地发布一个简单的一号战备命令，也就惹得毛泽东大为反感。

对此，林彪似乎也并无什么大的意见或想法。也许，他自己早就知道，他这个被亿万人民天天在高呼着“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林副主席、林副统帅”，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实质上会个什么模样？

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信中说，林彪他们“为了打鬼”，就借助他这个“钟馗”。实际上，恐怕在文革中做了“钟馗”的，不是毛泽东，而恰恰是林彪。

至于让叶群当政治局委员一事，从林彪平日对叶群的威严甚至有些蔑视的态度，就可以推断，决不会是林彪主动而为，实际他也确让叶不要当政治局委员。可是，毛泽东可能是为了平衡江青做政治局委员一事，还是要叶进了政治局。这，就不是林彪的责任了。

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回忆：“我在林彪身边工作了四年多，因为要‘讲文件’，差不多天天都能见他一面，所以可以说，我对文革中的林彪并不缺乏了解。然而我亲眼看到的林彪，在文革动乱中要么是遇事不表态，要么讲些‘绝’话，要么就是对他份内之责‘大撒手’。”

张云生所写的林彪在文革中的行踪，其特点，往往就是：经常天天一个人坐在那个黑房子里，凭心情好与否，而在一天中的上午下午各一次，各花二十来分钟时间，听听秘书选读一些文件什么的，基本不会客不见人，也无法过常人有的舒心生活。

已是这样一个人，究竟还会有多大的篡党夺权的心思与精力呢？

### （三）对结局过程的猜想

九届二中全会的庐山会议，一个天才问题，一个设国家主席问题，却将林彪卷进了万劫不复的政治旋涡。

人们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往往会为一些小事，大动平常不轻易动的肝火，为一些小问题与他人顶牛，发生与他人细细计较的事。其实，真是遇了大事，人们可能还冷静些，会前思后想考虑清楚。

也许当时在林彪看来，什么天才问题，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这不都是些说说话的小事吗？你毛主席为何这么揪住不放，小题大作，非得让人又是检讨，又是认错认罪什么的？

是不是林彪觉得：

不论陈伯达、还是黄吴叶李邱，还是汪东兴陈毅李雪峰等人，在会上说毛泽东是天才，说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他们这样做，也不都是向你毛泽东表忠心吗？原来大家称你是天才，你也没有反对过啊？为何，却一棍子将陈伯达打了下去，还说三十多年来从没有与陈配合好过！文革中陈伯达不是出了不少力吗？“九大”上还让他做了中央常委。

而现在，又追究起黄吴叶李邱！

追究就追究吧，让检讨就检讨吧。

可是，要让我也认错，让我也做检讨，这，却不干。

一，我没有什么错，我也不认为陈伯达、黄吴叶李邱他们说说那些有什么大错，只是你要让他们做检讨，那就做吧。

二，我这个病号，本来就不想出来做这个什么副主席副统帅，是你要我出来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我就不想参加，也请了病假在大连休养，但你硬是让秘书打电话要我回京与会的。现在，你就撤了我这些算了，我也无所谓。

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的那篇讲话，会前我不是已向主席讲过了吗？你不是没提什么意见吗？而且，会后，还是经你主席同意，全会各小组也才重新学习我那讲话录音，并由中央将讲话印发全会的嘛。

设国家主席一事，是中央五个常委，四个同意的。此事，开初我们确都以为是你谦虚（“九大”开幕时，你不是也曾谦虚的不当大会主席，而提议让我来做吗？），你既硬不同意，那就不设吧。可，这怎么能算一个什么原则大问题呢？

或许怀疑是我林彪想做国家主席？想提前接班？

不要说我根本没有体力精力，做那个经常要接见这个那个国家来宾的“国家主席”。

也不说我在出任这个党中央排第二位的副主席时，我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白说过：“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已决定了，我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还不说，这个国家主席，虽说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但实际上，还得服从党中央主席的，那政治地位与我现在的中央副主席并无实质提升，这是什么要“提前接班”？

就是退一步说，我真有想当这个什么国家主席的念头，也不是什么错误，也符合人之常情吧？你说不同意设国家主席职务，也许包含了不要我做国家主席的示意，那，就顺从你主席的猜测、想法，不设这个职务吧。

然而，你要让我在这件事上也作个检讨，好象我真犯了个大错误。对这，我不同意。

三，本来认认错也没多大关系，就是为了顾全你主席的面子，也应该认认错，可是，你现在也许真是斯大林晚年了，谁知你还要做什么文章啊？彭德怀一封明明是写给你个人的信，你却可以将它做反党文件大批人家，当事后彭听从叶剑英、聂荣臻二位老师的劝告：“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便被迫违心作了检讨，然而，一作检讨，没完没了的事却就都来了；刘少奇也做了检讨，还向中央办公厅交了他写的《检查书》，可是，不还是没完没了的追究人家？

还有最近的，陈伯达怎么了，不就是吹了一下天才论、搞了一份马恩列毛论天才的语录吗？

不就是他这个老夫子与张春桥姚文元那几个秀才关系合不来吗？你主席写了那么一大篇意见，说他错了，他就赶忙认错还认罪，也连忙大作检讨，可是，结果怎么样？他不还是落了个被撤职审查并被扣上了反党分子的大帽子？

所以，还是老办法，软抗。不说反对的话，但也绝不检讨。

可是，林彪如果真是如此心理，这一次，那他就想错了。

天才问题，国家主席问题，在毛泽东的眼中，已越来越不是什么小事了。

首先，在毛泽东放眼看去，林彪已是唯一可以与他几乎平坐的人，而远不是当年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与“四野”总司令那样仅为自己手下的一个方面大员了。现在，在林彪宦途的前面，已没有了朱老总、刘主席，也没有了彭大将军，甚至也没有了周总理他们的遮挡，因而，在毛泽东的视野里，此时林彪的任何问题，都不可避免会受到他的特别关注。

庐山会议前一年的1969年10月18日的所谓“林副主席一号命令”事件，即林彪同意、由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布的命令下达后，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的。这件事，就已显然令毛泽东很为不快（他当汪东兴的面将那报告烧了），更是埋下了毛泽东对林彪的第一个重大的猜疑理由。

林彪的这次先下令后报告的做法，不知是不是他曾有过的作风重演？还是确认为他作为副统帅可以先行下这样的命令？或者还是毛泽东曾授权给他过？

对这些疑问，不知有没有明确的肯定或否定证据？

而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在他的《毛家湾纪事》一书中，则说了所谓“林副主席一号命令”，是同时由叶群向毛泽东报告、而由张云生向黄永胜传达的。并且，叶群当时还说过，战争时期，林彪经常就是这种作风，遇到紧急情况，先当机立断，然后再报告毛泽东的。

只是，战争期间有过的先斩后奏或边斩边奏的那些指挥战役的作法，这次肯定是不适当了。因为，有“此一时与彼一时”之区别那千古道理在摆着。

18日之所以下这个一号战备令，是因为10月20日，苏联政府会谈中苏边界纠纷的代表团将乘机到北京，来参加谈判。而林彪则担心苏联方面会借谈判做烟幕，而发动实质性大规模侵略。因此，20日那天，林彪一反平日中午12时前就要睡觉的习惯，而一直在房间内听取关于苏联代表团的飞机行程报告，直到确知苏方代表团飞机是和平到达了北京时，他才安下心来。

由此可见，这个什么“林副主席一号命令”，确是军事问题。。

但毛泽东却不这么认为，他认定这是政治。

庐山会议上的什么天才问题，国家主席问题，毛泽东开始本来也不怎么在意，可是，当他发现陈伯达与林彪有联系，而起哄人中的黄吴叶李邱，又都是林彪的部下，显然，这就不能不使他神经紧张起来。

于是，不管林彪有没有想法，先拿陈伯达开刀，拿黄吴叶李邱开刀，逼林彪能象周恩来那

样立马顺从地认错服输再说。

林彪不是周恩来，他不认错，但也不争辩、或公开反对。

对此，毛泽东则采取了老办法，从基层做起，向基层先吹风，或多或少地透露了林彪的问题。战术上可以称之为“围点打援”。先将你这个副统帅的威信在下面打下来，到时候，看你这个副统帅还怎么能够“直接指挥”！看你认不认错！

不等毛泽东在打完“援”后来正面攻坚，林彪的老婆、儿子，却自我引爆，发生了外逃的“九一三”事件。对此，毛泽东则认为是“最好的结局”，以免批林及林外逃惹来的麻烦与很多解释不清的尴尬。

现在尚不知道的是，林立果的那些所作所为，是不是林彪事先已知道？

按林彪的历史性格分析推断，林彪应不可能同意林立果的那些主张。

现在能证明林彪参与知道林立果的那些事的证据，就是1971年9月8日写的那张纸条：“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但仅仅凭这样一张存在有无数种意义解释的纸条，显然还不可能就得出是“林彪指示林立果要谋害毛泽东”的结论。

而林彪“九一三”出逃那天的详情，现在虽有许多说法，但都没有直接的证据，明了说清楚当时林彪究竟是什么态度、而又有过一些什么样的表示？因为，对林立衡所说其父亲，是被其母亲与弟弟强行裹上飞机的讲法，绝对是不能当成虚妄之言而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也应予以证实真伪。

#### （四）假设的结局

有人说，如果林彪能在九一三事件前，向毛泽东认错并作出检讨，那么，他的下场，便远不会有后来发生的折戟沉沙、尸焚骨散、魂坠异域之惨境，至少，他还能做个政治局委员什么的，象其他老帅那样，获得一个平安的晚年。

这话，应该说，是有道理，也有依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对林彪这个人，截止“九一三”前，他还是埋怨多于愤恨的。除了一个九届二中全会风波上的问题，毛泽东尚还没有指责林彪有什么其他错误。

确实，在毛泽东看来，林彪不同于彭德怀，也不同于刘少奇，更不同于陈伯达。

先说彭德怀。

彭德怀秉性耿直，脾气暴躁，因此，不要说与其他老帅们关系不甚融洽——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叶剑英批判他时说：老彭啊，除了主席，其他人都有些怕你，那主席百年之后，你还会听谁的话？！——更重要的是，虽然他在内心也是佩服毛泽东的，但在平日表面上，他却不能象其他中央领导与老帅那样显示出对毛泽东应有的尊敬。在毛泽东面前，人家开口闭口都是称“主席”，而唯彭大将军经常张口的却是“老毛！老毛！”。

除了表面的作风，在毛泽东的心中上，彭德怀更是有着不少历史纠葛的旧帐，也始终未能让毛泽东释怀。例如，长征途中因林彪的信引出的会理会议及对彭的误解，自此以后的24年中，毛泽东就此事四次敲打过彭德怀。庐山会议批彭的中央常委会上，毛泽东更是清楚地历数了从井冈山时期开始与彭德怀有过的一系列争执，之中，使彭德怀也不能不对此诚恳检讨说明：“1934年一、二月后，我已转了，认为仍由主席领导好。”毛泽东尤其指责了彭在延安时期支持了王明，让彭任书记的华北局，竟然接受王明为首的长江局领导，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隔岸观火搞投机。毛泽东甚至对他与彭德怀共事三十年的合作性质评价，是三七开：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三成融洽，七成搞不来。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7月26日中央常委会上，开初还有过一次顶撞毛泽东的举动，其间，他更气愤地说过一句著名的粗痞话：“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的娘，我操你二十天娘还不行吗？”

对此，毛泽东会如何想？

在庐山，却说出反感延安整风期间的事，这不是记仇吗？这不是说明你彭德怀还在对延安挨批评而耿耿于怀吗？

对此，毛泽东又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很多人都以为彭德怀挨整，就吃亏在不该写那封批评大跃进的信。

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单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单纯！

顺便说说，1967年二月老帅们在怀仁堂，对中央文革表现的愤怒一事，毛泽东本来也是不以为然的，甚至，开始他听汇报时还发出过宽容的笑声。然而，当得知会上陈毅说出“延安整风不是抬出了一个刘少奇吗？后来又怎么样？”这些话时，毛泽东便刹时态度大变，气怒万分。结果，搞出了个什么“二月逆流”的问题。

陈毅那番话之所以触怒了毛泽东，就是因为它使毛泽东认为，陈毅他们是在翻最终名正言顺地确立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延安整风的铁案，而这，毛泽东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因此，陈毅便不大不小地的跌入了一次彭德怀的覆辙。

再回到林彪。

林彪可没有彭德怀的这些旧帐。在毛泽东的记忆中，林彪虽也常常做些不全符合他想法的事，也曾是一个手握重兵的大将。可是，在历史上，他却没有做过本性有“反骨”事。相反，贴心支持毛泽东的言行，从井冈山时便就开始有了。从感情上说，也许，在毛泽东的眼中，彭德怀是一个经常可以与毛泽东发生平起平坐争执的年长“大人”，而林彪则还是一个虽有些顽皮，但只要家长一指责，他就能收敛的“娃娃”。

小孩子犯错了，轻轻打他一下，就行了，而绝不须重罚。

所以，1956年的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中央主席时，毛泽东自己的那一票，竟然会投给林彪。毛泽东的这一票，虽然对林彪当选没有实质意义，但是，从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出毛泽

东心中的感情天平，偏向谁人。

再说刘少奇。

的确，刘少奇是毛泽东在延安期间极力推崇出来的领袖，从那时起，刘少奇就是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所以，刘少奇能从普通的政治局委员提升为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直至在1959年毛泽东退居二线后，受毛泽东委托，作为中央第二把手，主持中央全面的工作，并接替毛泽东当了国家主席。

应该说，毛、刘二人之间并没有不和的历史旧帐。在1955年的高饶事件中，毛泽东甚至不惜排开他曾看重过的高岗，而毫无保留地支持了刘少奇。尔后，毛泽东甚至还发出过“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的赞扬。

文革中，毛泽东之所以坚决打倒刘少奇，完全是1959年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后，毛、刘二人关系之间出现的新问题所致。

这些新问题，有二个方面。

一是中央的“一线”“二线”体制必然产生的对问题思考不同步的矛盾；二是，刘少奇未能体察出“一线、二线”体制必然带来的矛盾后，不可避免会做出众多不合毛泽东意见的事情，而刘却又未能在体制与人事（毛泽东）二者之间，取着重偏向人事的想法与态度。

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央先后出台了什么“前十条”与“后十条”，还又再出“二十三条”一事，便是典型例子。都是中央文件，都是用于四清运动的，可是，文件的政策指导却有分歧，因为，它们分别是由中央的“一线”与“二线”制定。

“一线”“二线”体制另外带来的一件事，便是刘少奇为了有效的主持中央工作，则不可避免会形成他的工作体系，使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与各部委、各地省市，都会与他发生逐渐紧密的直接联系。显然，这一切，必然也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毛泽东对他的猜疑与对大权旁落的担心。而1965年底，姚文元遵照毛泽东指示在上海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竟没能在北京等地被转载一事，更加重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负面疑虑，使他认定刘少奇另搞了一个他毛泽东竟“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却包括了邓小平在内的中央众多领导人都参入了的“司令部”。

因此，文革开始后，刘少奇对文革运动搞法心中无数而导致的种种举动，则更不可避免地最终使毛泽东对刘少奇采取了极端政策。

林彪呢？

虽然高居中央副主席、副统帅，可是，他却并没有刘少奇所曾拥有的权力，中央及中央各部委与各省市，包括军队系统，也都已直接向毛泽东负责。林彪在之中的作用，顶多是个“二传手”而已。对此，毛泽东无疑是深深明白的，在1971年他南巡前，就说过：“我不相信绝大多数人会跟别人走的。”这个别人，就是指林彪。

再则，刘少奇曾有一个相对独立负责的工作体系，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另有一个“司令部”，并且，刘在其中也很有权威。

但林彪没有什么体系，没有实质意义的他个人的“司令部”。

黄、吴、李、邱虽是他的旧部，但更是毛泽东的兵，他们向上汇报工作的对象，不仅有林彪，而还有周总理，当然，更有毛泽东。而林彪个人在整个文革期间，也极少与黄、吴、李、邱单独会面，至于黄、吴、李、邱上林彪住所的次数，就更是只能用“罕见”一词说明了。因此，黄、吴、李、邱确并非是林彪控制的亲兵干将，相反，在黄、吴、李、邱的心中，无疑懂得其权力的来源，决不仅仅是“林副主席”，而主要是毛泽东。所以，当“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吴法宪、李作鹏仍卖力协助周总理工作，指挥实施制空。

至于那些个如空四军空五军陈励云、江腾蛟等人，则更谈不上是什么林彪司令部的人了，也仅仅是尊敬“林副主席”而已，甚至只到毛泽东南巡时，才能猜测到林彪“也许出了问题”，事前却根本得不到林彪的半点信息。而当毛泽东一声令下时，他们则更是连忙投降检讨。

没有实际的中央权力，又没有一个会听命于他的从上到下的“司令部”，虽然林彪对“政变经”读过不少，但现实中的病夫林彪，又会有多大的造反能量呢？对此，相信毛泽东会有清晰的判断。

陈伯达的突然倒台，虽然给林彪带来了不安，但是，事情的实质，恰恰却正是因为与林彪有关，陈伯达才跌了这个永远爬不起来了的大跟头，而不是陈伯达的倒霉，影响牵连了林彪。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陈伯达的份量，显然是不可能与林彪等量齐观的。

然而，当发现陈伯达这个秀才竟然与林彪元帅以及“四野”那班大将，有着密切的联系时，毛泽东便不会无视陈伯达可能有的潜在危险了。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他常常喜欢同秀才们文化人们往来，甚至还交朋友。但这其间，他也有个潜规则，那就是：他身边的秀才要始终安于做秀才，文化人要潜心只是谈文化；即便论及文化之外的事，也应与他知晓通气，否则，他便会毫不犹豫地撇开他。

这点，前已有周小舟、田家英、李锐，后有胡乔木，再又有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的命运，予以证明。

奇怪的是，跟随毛泽东几十年的陈伯达，到头来竟然还要犯这个规！这，不知究竟是因陈伯达确属书呆子气过重所致，还是他做了中央常委后，真有了些利令智昏。

在中央文革，陈伯达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产生了矛盾，并且几年中又发展而日益加深，这并不很要紧。重要的是，千不该万不该的是，他不是向毛泽东倾诉与申诉，以求公平，而却向林彪及黄吴叶李邱去寻找支持。这一来，毛泽东对林彪他们犯疑的头一棒，便不可避免地要打在这个老夫子身上了。

如果说，对其他党政领导人或党外知识分子名人的处罚，毛泽东还需权衡再三，才会下决心。那么，惩处他认为犯了大错的党内秀才，毛泽东则就会无多顾及，想到即办。

1959年庐山会议前段的“神仙会”，毛泽东与周小舟、李锐等秀才，尚还是一身轻快的谈笑风生，论天说地。然而，没过几天，当发现秀才们居然与彭德怀有共鸣时，他便毫不犹豫地周小舟打入反党集团成员的行列，将李锐痛斥后交与水电部批判。



文革中期，对王、关、戚也是如此。1967年的7月25日还让在天安门广场开百万群众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视谢、王为文革英雄。可是，过了十天，毛泽东在上海看了一些文革形势与状况的材料后，却又突然指示杨成武回北京，将中央文革的几大秀才王力、关锋、戚本禹，毫不留情地给抓了起来（戚本禹稍后才抓）。

1970年，这厄运，则轮到了陈伯达的头上。

但是，林彪是战将，不是秀才。

当然，在毛泽东心目中，林彪也不是彭德怀，不是刘少奇。

如果，没有“九一三”，对林彪的处理，毛泽东显然会要再三权衡，也显然会考虑到林彪对革命及对他毛泽东有过的历史功劳。何况，在毛泽东内心深处，还永远深深的感激着一个人，那就是张浩。当年，在党中央与手握红四方面军几万重兵的张国焘另立中央的行径作斗争之时，就是这个从苏联回国的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坚决地指责了张国焘，也震慑了张国焘，使张国焘不得不撤消了他的“中央”，回归延安，从而有力的支持了党中央与毛泽东。所以，张浩病逝于延安时，毛泽东亲自为其抬棺并奠土入穴。

而这位在毛泽东心中，对党与他毛泽东功重于山的张浩，就是林彪的亲密堂兄，本名林育英。

可以相信，中国人常有的“爱屋及乌”情结，也不会不对毛泽东的心理，发生些许的影响。

而如果林彪能在适当时候，就九届二中全会上事做了检讨，向毛泽东认了错，适时“下毛泽东给他的台阶”，纵观历史上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应该说，林彪不至于重蹈彭德怀、刘少奇与陈伯达的命运覆辙，至少，能保有一个平安的晚年。

只是，不知性格貌似恭顺实则内倔的林彪，会愿意下毛泽东为他铺就的那个“台阶”吗？

1971年五一节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出现的一幕，似乎已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时，林彪在勉强接受周恩来的安排，到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等人坐到了同一桌旁，然而，他却不同毛泽东讲一句话，一言不发，敷衍默坐了数分钟，尔后，竟当着西哈努克亲王的面，不辞而别，拂袖离去。

的确，在亿万中国人天天都还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之当时，这是史无前例的。

而顺便说说，回过头来看，一个若是心存大阴谋大诡计的人，在天安门城楼的这个晚上，因需要“克己复礼”，那他的所作所为，尽可以假象层层花样百出，而唯独似乎不应做的，便是露出一付怨气冲冲的公开不满之态。

可是，离“九一三”只有四个半月不到之时，林彪却的确以这个形象定格在了历史的那一页中。

另外，这个假设结局的前提，是要没有那个崇拜“江田岛”法西斯精神的林立果所搞的那些名堂。

还有，要不发生“九一三”出逃事件。

当然，历史，并没有“如果”。

□ 2 0 0 4 • 2 • 2 3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